

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 —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

朱鳳玉*

壹、前言

自 1900 年敦煌藏經洞發現以來，已經歷了一百年的歷程。就中國敦煌學研究發展而言，敦煌文學研究是較早開始，且成就最為突出，成果也最為豐碩。不論是傳世文獻，或是通俗文學，在研究的質與量都有極為卓著的成果。根據《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漢學研究中心，2000.04）、《1998-2005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樂學書局，2006.08）的著錄，其收入有關中、日文敦煌文學研究論著約有 2500 篇之多。尤其許多重要的門類，如敦煌變文、敦煌曲子詞、王梵志詩、敦煌的詩歌，不但陸續有整理校錄的文本出版，同時也有不少頗具系統而深入的研究論著產生。

學術研究發展的生命力在於新材料、新方法、與新觀點。因此，只要我們能持續的發掘新材料，或系統地吸取研究成果、利用妥適的新研究方法來探討新的問題，或對舊問題展開新的詮釋。如此一來，敦煌文學研究仍然可以煥發出新的活力，開拓出學術的新天地。本人承國科會之獎勵執行「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三年計畫，¹對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展開考察，對敦煌文獻中的文學材料進行系統發掘；對研究論著進行總帳的論述並客觀的評

*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¹ 本計畫獲國科會獎勵補助三年，計畫編號：NSC 91-2411-H-415-001，執行期間：2002 年 8 月 1 日至 2005 年 7 月 31 日。

驚；同時對敦煌文學的研究方法進行考察研究²。其間除了對敦煌文學研究進行總體的考察³，及敦煌文學大家進行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的析論外⁴，更對敦煌文獻中有關文學的重要體類如曲子詞、敦煌賦、白話詩等進行各類文學研究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⁵，吸取前賢的研究成果與經驗，作為研究之借鏡，更供作敦煌文學教學之參考。

近年在研究與教學相互激盪與成長中，更深刻體會到敦煌文學的研究發展，除了研究範疇的再界定、研究材料的再爬梳、校錄文字的再確認、研究方法的再創新外，更期許自己能在研究視野上更為開闊。尤其文學是社會的產物，特別屬於俗文學的敦煌變文、曲子詞、白話詩、俗賦等等，作者多為半知識份子，所使用的語言為民間口語白話的俗語言，作品呈現的思想內涵則是民間的俗文化，與一般傳統世人文學有別。尤其是地處西北邊陲、胡漢雜處的敦煌，其文學的表現尤其地方色彩與歷史特質。因此，開始廣泛吸取唐五代歷史、社會、文化等學科的相關知識，希望透過「以唐考敦，以敦證唐」來拓展敦煌文學研究與教學的視野。今有幸 應邀參加『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研討會』，特嘗試以敦煌詠史詩《古賢集》為主，結合蒙書、類書與民間歷史教育的相互關係為例，說明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敬請 方家，有以教之。

貳、敦煌詩歌體歷史知識蒙書《古賢集》

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二、三十種敦煌蒙書中，《古賢集》是一種以七言歌行體的詩歌形式來歌詠歷史人物孝友、勤學、誠信、忠貞等事蹟，教示學童的通俗讀物。可說是敦煌蒙書中極具特色的一種。

² 〈俄藏敦煌文獻 11-17 冊中之文學文獻敘錄〉，《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法光出版社，2003 年 7 月），頁 57-116。

³ 〈臺灣地區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與展望〉（《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9 月。），頁 276-289；〈日本敦煌文學研究成果和方法之考察〉（《敦煌學·日本學：石塚晴通教授退職紀念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14-35。

⁴ 〈潘重規先生敦煌文學研究成果與方法之考察〉（《敦煌學》25 輯，2004 年 9 月。），頁 115-134；〈饒宗頤先生敦煌文學研究成果與方法之考察〉（《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1 月）；〈王重民先生與敦煌文學研究〉（《敦煌學國際研討論論文集》，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魯番資料研究中心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1-13；〈關德棟與敦煌俗文學研究〉（《東亞文化研究》第八輯，香港：東亞文化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 98-114。

⁵ 〈敦煌曲子詞研究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文學新論》4，2006 年 7 月），頁 19-34；〈敦煌賦的範疇與研究發展〉（『潘重規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6 年 3 月）；〈敦煌詩歌研究的反思與展望〉（『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6 年 12 月）。

以歷史掌故及人物事迹為主要內容而編纂的蒙書，讓兒童誦讀、記憶，以便灌輸歷史知識，並透過歷史人物的行為典範，教導孩童忠孝仁義等品德，相較於講理說教的蒙書，更能吸引孩童，同時也更能豐富學童的寫作題材與表達的內容。這類蒙書主要從唐代發展起來，有採用對偶押韻四字句形式的，如《蒙求》；有採七言詩歌形式的，如《古賢集》；也有編年體的詩歌，如《讀史編年詩》⁶。就詩歌文學的立場來看，《古賢集》與《讀史編年詩》無疑的可歸入詠史詩。所以今人如項楚的《敦煌詩歌導論》與徐俊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在校錄與討論敦煌本《古賢集》時，均將這些作品視為詠史詩⁷。《古賢集》這篇七言歌行體的長篇詩作，後世不傳，歷代史志目錄也沒有著錄，今幸賴敦煌石室遺書的保存，世人才得以一窺它的風采。

根據現在已經公布的敦煌寫卷，《古賢集》總計有九件，分別收藏在英國、法國及俄國。編號是：P.2748、P.3113、P.3174、P.3929、P.3960、P.4972、S.2049、S.6208、DX2776。根據這些寫本殘卷我們有幸得以獲睹這一篇完整民間通俗歷史教育詩歌的全貌。有關《古賢集》的研究，1974年陳祚龍在〈敦煌學雜記〉⁸中提到有關中古敦煌流行的蒙書，曾根據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六件《古賢集》寫本，進行校錄。1976年陳慶浩〈古賢集校註〉⁹在陳祚龍的基礎上，加上英藏的二件《古賢集》寫本，重新進行校註。1984年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第五章〈敦煌通俗詩考述〉¹⁰，將《古賢集》列為「史事長篇歌詠」，立專節加以論述。1988年韓建瓚〈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¹¹，則是針對各家說法進行商榷。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¹²也有校錄，我在與鄭阿財合撰的《敦煌蒙書》一書中，對此文獻曾有總結研究與錄文。以下是法國藏編號 P.3174 完整的《古賢集》寫本影本：

⁶ 《讀史編年詩》為趙嘏之作，與胡曾《詠史詩》、周曇《詠史詩》等時代、階層、性質相近，同屬中晚唐文人大型詠史組詩。敦煌寫本有 S.619 一件，王重民先生早年曾抄歸，生前不及披露，後由夫人劉修業女士整理撰成〈敦煌本《讀史編年詩》與明代小類書《大千生鑒》〉發表於《敦煌語言文學研究》（1988年7月，北京大學出版，頁222-239）。之後，乃有人探究，如：謝巍〈敦煌本《讀史編年詩》作者佚名考及其他〉（《江海學刊》1989：6，1996年12月）；陶敏〈敦煌寫本《讀史編年詩》的內容與作者〉（《咸寧師專學報》16：2，1996年5月），頁50-51；趙望秦〈趙嘏《讀史編年詩》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2004年11月），頁67-70。

⁷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第三章民間詩歌〉「詠史事」一節討論《古賢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5月），頁191-194；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147-153，則有校錄。

⁸ 載《幼獅月刊》（第四十卷第五期，1974年5月），頁56-61。

⁹ 載《敦煌學》（第三輯，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1976年12月），頁63-102。

¹⁰ 見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年7月），頁191-204。

¹¹ 收入《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頁150-176。

¹²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147-153。



P. 3174 《古賢集》寫本

從體制上看，《古賢集》全篇以「君不見」三字作為起句的冒頭語，之後則是以七言 40 韻，80 句，560 字，集合古代諸聖賢事跡，撰成長篇歌詩。全篇押韻的情形，共用真（與文韻通押）、魚（與虞運通押）、麻、支等四韻，皆平聲韻，形式十分整齊。基本上多以一句來歌詠一位賢人，間有用二句歌詠一位賢人，其中較為特殊的是以四句來歌詠姜太公的事蹟。現將全文校錄如下：

君不見：

秦皇無道枉誅人，	選士投坑總被墳；
范雎折肋人疑死，	誰言重得相於秦。
相如盜入胡安學，	好讀經書人不聞；
孔丘雖然有聖德，	終歸不免厄於陳。
匡衡鑿壁偷光學，	專錐刺股有蘇秦；
孫敬懸頭猶恐睡，	姜肱翫業不憂貧。
車胤聚螢而映雪，	桓榮得貴賣金銀。
造賦題篇曹子建；	羅含吞鳥日才新。
甯戚馳車齊國相，	朱買貧窮被棄身。
晏子身微懷智計，	雙桃方便煞三臣。
許由洗耳潁川渠；	巢父牽牛澗上驅。
夷齊餓首陽山下，	遊巖養性樂閑居。

荆軻入秦身未達，	不解琴吟反自誅。
蘇武落蕃思漢帝，	身憑鴈足與傳書。
燕王被囚烏救難；	干將造劍喪其軀。
為父報讎眉間尺；	直諫忠臣伍子胥。
結草酬恩魏武子，	萬代傳名亦不虛。
靈輒一食扶輪報；	隨侯賜藥獲神珠。
太公少年身不遇，	八十屠鈞自釣魚；
有幸得逢今帝主，	文王當喚召同車。
江妃淚染湘川竹；	韓朋守死嘆貞夫。
蜀地救火有鸞巴，	發使騰星檢不賒。
東方入海求珍寶，	船頭迴面笑官家。
董仲書符去百惡；	孫賓善卜辟妖邪。
張騫奉使尋河路；	王母乘龍戴寶花。
歎念閻浮漢武帝；	費糧奉命度流沙。
誰見牽牛別織女；	唯聞海客鎮乘槎。
延陵留劍掛松枝，	墳下亡人詎得知。
伯桃併糧身受死，	參辰無義競妻兒。
庭樹三荆恨分別；	恆山四鳥嘆分離。
割袖分桃漢武帝；	楊朱歧路起愁悲。
曾參至孝存終始，	一日三省普天知。
王寄三牲猶不孝，	慈母懷酬鎮抱飢。
孟宗冬筍供不闕；	郭巨夫妻生葬兒。
董永賣身葬父母，	感得天女助機絲。
高柴泣血傷脾骨；	蔡順哀號火散離。
思之可念復思之，	孝順無過尹伯奇。
文王得勝忘朋友，	放火燒山覓子推。
子夏賢良能易色；	顏淵孔子是明師。
集合古賢作聚韻，	故令千代使人知。

在內容表現上，正如詩的最後二句所說：「集合古賢作聚韻，故令千代使人知」。其主要內容大抵述孝友、勤學、文章、仕宦、誠信、忠貞等事蹟，是以人物為主，配合其事蹟，灌輸歷史故實，藉以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以資啓發。就功能而論，蓋以精簡通俗的詩句，概括歷史人物的經歷，便於學童朗誦，快速的掌握歷史故事，既可敦品勵學，又可積累相關歷史知識；同時還能在詩歌韻味的浸淫中，培養作詩的基礎。因係為童蒙教育而編的教材，所以內容較為集中在歌詠古人奮發勤學的事蹟，例如「匡衡鑿壁偷光學，專錐刺股有蘇秦。孫景懸頭猶恐睡，姜肱

翫業不憂貧。車胤聚螢而映雪，桓榮得貴資金銀」等。透過這些勤學典範的古賢，勉勵學童，勤奮向學。

至於《古賢集》的時代，九件寫卷中，三件附有題記書寫年代。據 P.3113 的題記，可知為索祐住禪師於「後唐清泰貳年丙申三月一日」所抄寫，然因清泰貳年（西元 935 年）為後唐廢帝乙未年，次年方為丙申年（西元 936 年），這當是抄寫錯誤。另外，S.6208 只存月日及書寫者姓氏，年份的部分正好破失了，以致無法可考。P.2748 卷背《百歲書》序和正文中間，為襯紙文字所隔開，且《百歲書》序有兩行寫在襯紙上，可知抄寫前已有襯紙，而襯紙上有日期為「大中四年七月廿日」，「大中」為唐宣宗年號，大中四年為西元 850 年，顯然 P.2748 這件寫卷應該是抄寫在大中四年以後。

此外，「孫敬懸頭猶恐睡」，《藝文類聚》引《後漢書》有：「孫敬，字文質，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樑，人曰閉戶先生。」指的應該就是這個典故。而《古賢集》抄本作「孫景」，當是避五代時後唐高祖石敬瑭的名諱而改。整體而言，《古賢集》雖然作者不詳，然從題記、抄寫情況與寫卷書風等，綜合考察，其流行時代當在晚唐，至於創作時代，則很可能是在大型詠史組詩與蒙書盛行的中晚唐時期。

參、蒙書、類書與詩歌

蒙書從體制論，有採類書形式編纂的；從功能論，同時也具備有日常類書尋檢的實用功能。今所得見敦煌石室保存的文獻中，採書抄彙聚類書形式編纂的蒙書，如《新集文詞九經抄》、《新集文詞教林》一類便是；有分別部居，標舉名目的，如《俗務要名林》等；有採類句形式，編纂成編的，如《蒙求》；也有採詩歌體式成編的，如《古賢集》。這些體式均與歷代各形類書的體式相似。這些文獻，就功能論、性質論，顯然作為童蒙教材之用，當屬蒙書一類；從編纂的形式論，與類書的確無二，且亦具有實用類書的功能，歸入類書。因此自來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或從類書視角來考究¹³，或從蒙書面向來探研¹⁴。這些看似分歧，

¹³ 王三慶在《講座敦煌 5 敦煌漢文文獻》中〈類書〉一節（東京：大東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357-400。便提及舊文排列體收錄有《事森》、《新集文詞教林》、《新集文詞九經抄》；類句體收錄有《蒙求》；詩體收錄有《古賢集》；文賦體收錄有《兔園策府》；何論體書抄收錄有《雜抄》。而在他的鉅著《敦煌類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3 年 6 月）中，更有研究、錄文與校箋，系統而深入研究。

¹⁴ 如鄭阿財〈敦煌蒙書析論〉（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1 年 6 月），頁 211-234。討論的對象包括了《俗務要名林》、《蒙求》、《新集文詞集九經抄》、《文詞教林》、《兔園策府》、《雜抄》等；東野治之〈訓蒙書〉一文（載《講座敦煌 5 敦煌漢文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401-438，據《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臚列訓蒙書二十六種，四十七件抄本，其中也收入了《兔園策》、《雜抄》、《俗務要名林》、《事森》等。

實則有其一定的道理；更凸顯了蒙書體制與類書的密切關係。其實，有關蒙書與類書糾結的問題，早在余嘉錫《內閣大庫本碎金跋》中已關注到此一問題。他說：

諸家目錄皆收此書入類書類，蓋以其上自乾象、坤儀，下至禽獸、草木、居處、器用，皆分別部居，不相雜廁，頗類書鈔、御覽之體。然既無所引證，又不盡涉詞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審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識，取便童蒙，蓋小學書也。¹⁵

足見類書與蒙書在體例形式與功能作用上頗多交涉，諸家目錄著錄此類書籍時皆收入類書；實際在民間使用上則是取便童蒙，則又歸屬蒙書。如此分歧，蓋以文化階層不一，視角不同，歸類自然有異。有見於此，本人以為文獻乃社會文化的產物，尤其在時空環境與文化階層的發展、演變下，所呈現的更是多元的文化現象，存在著多重的文化因素；單一面向的考察，實難以具足圓滿。過去目錄學家在圖書分類時，已面臨類似的問題，為了解決此一問題，因此也就有了『互著』的產生。¹⁶

不僅類書與蒙書存在這樣密切且糾葛的問題¹⁷，就是類書與詩歌，蒙書與詩歌也存在同樣的問題。¹⁸對於類書與詩歌的關係，近代較早進行探究的主要有聞一多，他在〈類書與詩〉一文¹⁹裡針對唐初五十年文壇進行考察，以為類書是當時著述物中第三種性質的東西，「它既不是文學，又不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的編纂，不難明白唐太宗所鼓勵的詩，是「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聞氏此文雖然是篇論述初唐詩壇的短文，但從文學與學術關係的視角，特別是「類書與詩」的互動，確實頗有見地，也開啓了唐代詩學研究的另一片視窗。不過，對於類書與詩體發展及其關係的具體探討則少論及。

¹⁵ 見《余嘉錫論學雜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3月），頁605-606。

¹⁶ 所謂『互著』，也就是參照法。是文獻著錄時，針對一書可分入兩類時所採用的方法；明·高儒《百川書志》是最早採用互著法的書目；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則對互著的宗旨加以闡釋，以為互著與別裁是作為解決類例間學術相互聯繫現象的一種方法。他說：「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家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復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檢稽而已。」

¹⁷ 如唐·李翰《蒙求》，《宋史》卷202〈藝文志〉著錄在「經類·小學類」；又同書卷270〈藝文志〉「子類·類事類」也著錄。

¹⁸ 如唐·李嶠《雜詠詩》十二卷，《新唐書》卷60〈藝文四〉著錄在「丁部集錄·別集類」。

¹⁹ 〈類書與詩〉，原載《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三十五期，收入《聞一多全集》卷3〈唐詩雜論〉（三聯書店，1984年）。

由於域外漢文學研究的發展，近年對日本漢文學研究視野漸開，盛傳於日本的初唐李嶠《雜詠》漸受矚目²⁰。按李嶠《雜詠》，全編一百二十首，乃一採用與類書體制相同而寫作的大型五律詠物組詩。吟詠的題材，分別從日、月、星、風到珠、玉、金、銀，種類繁多。每題一詩，計一百二十題，分屬：乾項、坤儀、芳草、嘉樹、靈禽、祥獸、居處、服玩、文物、武器、音樂、玉帛等十二類，每類十首。持與初唐類書《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等相較，其標目與分屬門類相合，詩題序列亦一致，顯見初唐代文人詠物風潮與文士編纂類書之密切關係。有關此一問題，近代唐代文學研究者已多所關注。²¹

另一方面，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的發現，從神田喜一郎、王重民、黃永武、王三慶到徐俊〈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校疏〉，大家對這一保存至今的唐人詩集注本投以相當的注意；或考論其文獻，或評析其詩學價值，更有全面校理注疏的呈現²²。至於有關《雜詠》的類書性質，王三慶在研究敦煌類書時，便立有「詩篇體之類書」，其中便收錄了《李嶠雜詠·張庭芳註本》與《古賢集》。之後，葛曉音在〈創作範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詠》談起〉一文中，則從詩學的角度來觀察，並更進一步的指出「這種大型詠物雜詩的出現，應與唐初以來大修類書的風氣有關」²³。論證《雜詠》採用五律分類詠物組詩的形式，是受「初唐以來專講對偶聲律的著作常用的示範方式的影響」，為「唐初以來的作文入門類著作的慣例」，也與「唐初以來詩歌創作、類書編排以及指導對偶書特別重視詠物有關。」²⁴徐俊以為這無疑都是正確的。同時更提出應進一步的注意到它受唐初盛行的《文選》和《文選注》的影響。²⁵

²⁰ 李嶠《雜詠》我國雖有著錄而失傳甚久，至嘉靖間日本天澤氏（林衡）刻《佚存叢書》本始收入，又有正覺樓叢刊、藝海珠塵刊本，《全唐詩》復輯入。近人又整理出敦煌寫本《雜詠》殘篇。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更出版了胡志昂編《唐李嶠撰·張庭芳注《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

²¹ 如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台中：東海大學1971年8月；姚華：〈類書與中國古代文風〉（《東方論壇》2003：2）頁58-64；唐雯：〈《藝文類聚》、《初學記》與唐初文學觀念〉（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3：1，2003年1月），頁77-80。

²² 神田喜一郎〈敦煌本《李嶠百詠》〉（《東方學會創立十五周年紀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62年7月），頁63-70；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李嶠雜詠註〉（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年6月），頁289-290；黃永武〈敦煌本李嶠詩研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1：8，1988年8月），頁8-15；枋尾武〈大英圖書館蒐集555敦煌本《李嶠雜詠注》殘卷一考察〉（《成城文藝》157，1997年1月），頁1-32；胡志昂〈李嶠雜詠注考——敦煌本殘簡を中心に〉（日本宋代詩文研究會《橄欖》雜誌，第二期），徐俊〈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校疏〉（《敦煌吐魯番研究》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9月），頁63-86；段莉萍〈從敦煌殘本考李嶠《雜詠詩》的版本源流〉（《敦煌研究》2004：5，2004年10月），頁74-78。

²³ 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第四章初唐山水詩的復變〉（瀋陽市：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年1月），頁140-141。

²⁴ 見《文學遺產》（1995：6，1995年12月），頁30-41。

²⁵ 見徐俊〈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校疏〉（《敦煌吐魯番研究》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9月），頁63-86。

葛曉音還根據研究「平安時期日本漢文學」專家川口久雄的看法²⁶，以為：「初唐詩人李嶠的《雜詠》120首，也曾與白居易的新樂府和李翰的《蒙求》一起，在日本被列為平安時代傳入的中國三大幼學啓蒙書。」然而這一事實長期以來一直為中國學者所忽略。²⁷早年神田喜一郎〈李嶠百詠雜考〉一文中引古賀精里〈李嶠百詠箋略〉序便提到：「李巨山詠物凡一百二十首，其命題也博，其取材也贍，可抵一部類書矣。予幼而讀之，頗苦勾棘，迺欲搜討群籍，集為之注釋。」²⁸

長期以來，由於從事敦煌詩歌與敦煌蒙書研究的關係，對於以詩歌作為蒙書及蒙書採用詩歌體式，乃至二者之間的相互交涉尤為關注。竊自以為：李嶠《雜詠》是唐人普及五言律詩的啓蒙教材，唐代日本遣唐使、留學生也據以為學習漢詩的典範，並攜返日本，成為平安時期日人學習漢詩的熱門詩集。²⁹對葛教授的看法，本人除深表同感外；更從唐代文學史與文化發展的視野來關照，乃由初唐詠物詩延伸到唐代詠史詩的面向，特別是晚唐的大型詠史組詩與蒙書的發展。

近期的唐詩研究，從過去對個別有名作家的研究進而擴展到詩人群體集團、詩歌流派乃至詩歌類型的研究。唐詩題材分類研究，成為一時風潮。作為唐詩重要內容之一的詠史詩，在分類題材研究上，成果豐碩。綜觀研究方向，首在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劉禹錫等作家詠史詩創作之研究；其次則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詠史詩分段的研究；再者則是詠史詩歌詠的人物、事蹟；最後則是通代整體的研究。³⁰而其研究大多據時代特色，對詠史詩的界義、起源、發展、價值、創作背景及藝術表現等，進行概括性的總結，中晚唐大型詠史組詩研究的開展，尤受矚目。如趙望秦《唐代詠史詩組考論》³¹，對吳筠、趙嘏、胡曾、周曇、汪遵…等人的詠史詩進行考論，可說是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之後，趙氏又有《宋本周曇詠史詩》研究³²，對周曇詠史詩的主旨性質、史學思想、文獻價值與影響，多所立論，並對作品進行詳細校證。然而對於中晚唐大型詠史組詩的陡增，如趙嘏《讀史編年詩》110首，胡曾《詠史詩》150首，周曇《詠史詩》195首…等出現的文化因素，似乎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²⁶ 見川口久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第二十六章第六節（東京：明治書院，1961年3月）。

²⁷ 見葛曉音：〈創作範示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詠》談起〉（《文學遺產》1995：6，1995年12月），頁30。

²⁸ 神田喜一郎〈李嶠百詠雜考〉，《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二卷〈續東洋學說林〉（京都：同朋舍，1984年11月），頁65-86。

²⁹ 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別集家」著錄：「李嶠百廿詠一」。

³⁰ 可參馮傲雲〈新時期唐代詠史詩研究綜述〉（《咸陽師範學報》2005：3，2005年6月），頁59-62。

³¹ 趙望秦《唐代詠史詩組考論》（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2003年。）

³²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2005年12月。全書分考論與校證二編。

早在 1948 年，張政烺〈講史與詠史詩〉³³便從另一面向對晚唐敘事型詠史詩提出深入的看法。他以胡曾為例，指出流傳至今的《新雕注胡曾詠史詩》，有「邵楊叟陳蓋注詩，京兆郡米崇吉評注」，整個體製與平話體製「已甚相近」，而提出了講史淵源於晚唐詠史詩的觀點。近人研究敦煌講史變文與講史話本，對此說法多持肯定，而加以援引論述；任二北以為：「中唐胡曾與唐末周曇，各有詠史詩百餘篇。其詩亦曾配合說白，講吟於市廛或宮廷間。」³⁴對於詠史詩與講史關係具體深入研究的，也是繼承張氏觀點以晚唐詠史對後世平話影響為主，如李宜涯的博士論文《晚唐詠史詩與平話演義之關係》³⁵。至於，以當時文化因素來探究中晚唐大型詠史組詩的，則不多見。

1994 年張晨〈傳統詩体的文化透析—《詠史》組詩与類書編纂及蒙學的關係〉³⁶提示了詠史組詩與童蒙教育的關係，並且留意到詠史組詩与類書、蒙學之間的關係。雖也注意到敦煌寫本趙嘏《讀史編年詩》³⁷，但所論述的不論趙嘏、胡曾、周曇，這些作者多是中晚唐的詩人，身份、地位、學養均屬中上層文士，他們所做的詠史詩，呈現的意涵雖然與東漢以來詠史詩的傳統，及唐代大小李杜等名家詠史詩的情懷與格調迥異。東漢以來詠史詩的傳統，多為詩家個人對歷史人事的詠歎與感懷，更多是借古人之酒澆我心中之壘塊，呈現的是個人的歷史觀感與藝術表現；中晚唐如趙嘏、胡曾、汪遵、周曇…等詠史詩的湧現，其性質不同於大小李杜抒發個人情懷之作。然與民間純粹為學童而編寫詩歌體式的歷史類蒙書，其文學性仍然高出許多，且不能代表下層民眾的文化意識。

敦煌本蒙書《古賢集》，不著撰者，蓋為中晚唐時期從事民間私塾教育的基層知識份子所撰作，用以作為民間童蒙教育的歷史教材，所呈現的自然更貼近廣大民眾的心理，而其形式體制與功能，足以說明中晚唐時期蒙書、類書與詠史詩相互交涉的現象。

³³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分冊，1948 年，頁 602-645。

³⁴ 見任二北《唐聲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19。

³⁵ 李宜涯《晚唐詠史詩與平話演義之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 2 月）。

³⁶ 《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4：4，1994 年 12 月，頁 98-105。

³⁷ 《讀史編年詩》為趙嘏之作，與胡曾《詠史詩》、周曇《詠史詩》等時代、階層、性質相近，同屬中晚唐文人大型詠史組詩。敦煌寫本有 S.619 一件，王重民先生早年曾抄歸，生前不及披露，後由夫人劉修業女士整理撰成〈敦煌本《讀史編年詩》與明代小類書《大千生鑒》〉發表於《敦煌語言文學研究》（1988 年 7 月，北京大學出版，頁 222-239）。之後，乃有人探究，如：謝巍〈敦煌本《讀史編年詩》作者佚名考及其他〉（《江海學刊》1989：6，1996 年 12 月）；陶敏〈敦煌寫本《讀史編年詩》的內容與作者〉（咸寧師專學報 16：2，1996 年 5 月），頁 50-51；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趙望秦〈趙嘏《讀史編年詩》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2004 年 11 月），頁 67-70。

肆、從《古賢集》看詠史詩體蒙書的文化因素

一、《古賢集》的詠史詩體因素

童蒙教育以識字為先。識字之後，則一方面誦讀各類知識；一方面學習為文做詩。優美淺近的詩歌便於吟哦朗讀，又易於記誦。既可陶冶性情，又可培養品德。加以唐詩發達，科舉考試，以詩賦取士，因此童蒙讀物每每挑選適合童蒙誦讀的詩篇；詠史詩一類的蒙書，是唐宋新起的教材形式之一。不過世人對宋以後的《千家詩》、《神童詩》等所謂兒童詩歌教材較為熟悉。事實上，晚唐五代時期便有為童蒙而編的詩歌，有以格言入詩，用以教示童蒙行為規範，訓誡兒童立身處事等，如敦煌寫卷中的一卷本《王梵志詩》及《夫子勸世詞》都採五言詩體。

晚唐時期流行於敦煌地區的《古賢集》是歷史教育的詩歌體蒙書，將典範的歷史人物彙括入詩，以七言長篇呈現。使學童誦讀簡單詩句，便能將鮮明的人物事蹟牢記於心。這些歷史知識的積累，有助學童進一步的學習。就詩歌的觀點論，屬於中晚唐詠史詩的《古賢集》，他的流行自然有詩歌發展上的文化因素存在，以詠史詩體類作為蒙書，也是中晚唐時蒙書樣式的新拓展。

中晚唐時期，詠史詩風行，許多詩人有意的創作詠史詩³⁸。像胡曾、周曇等人，動輒百首的大型詠史組詩，更是一時盛況；對當時的歷史教育與童蒙教育有著一定的影響。《古賢集》的出現，當是在這種流行文化環境下，加上在傳統各種形式通俗讀物的發展歷程中，基於唐詩的成熟與普及，所產生篇幅不長，容量極大，且適合學童傳誦記憶的詩歌體蒙書。

史傳表現的是史家的歷史觀，及對歷史人物事件的看法與評價，傳統文人的詠史詩，表現的是文學家個人對歷史的見解與觀感，更多的是借古人之酒杯，澆我心中之壘塊，抒發個人之感懷；中晚唐大型詠史組詩則說教勸戒、語存諷意，詩多直陳而乏性靈。詠史詩體的蒙書，所詠人物多為歷史中之忠孝節義、智信仁勇典範式的人物，詩多平易，造語淺俗，便於琅琅上口，形象鮮明易記。

³⁸ 據統計，唐代詠史詩總數約有 1442 首，其中晚唐則多達 1014 首，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參見王紅〈試論晚唐詠史詩的悲劇審美特徵〉（《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3，1989 年 9 月），頁 83-89。

二、《古賢集》兼具蒙書與類書的雙重特質

《古賢集》的產生與流行，除了存在著中晚唐詠史詩發展的文化因素外，也存在著傳統類書事類取向的文化因素。王三慶《敦煌類書》中曾將《古賢集》的內容歸納分類為以下幾類：

- (1) 勤學：匡衡、蘇秦、孫敬、姜肱、車胤、桓榮；
- (2) 文學：曹子建、羅含；
- (3) 窮達：寧戚、朱買臣；
- (4) 聰智：晏子；
- (5) 隱士：許由、巢父、夷齊；
- (6) 忠烈：荆軻、蘇武、燕太子丹、干將、眉間尺、伍子胥；
- (7) 報恩：魏武子、靈輒、隨侯；
- (8) 知遇：太公、文王；
- (9) 貞烈：江妃、韓朋貞夫；
- (10) 方術：鸞巴、東方朔、董仲舒、孫賓；
- (11) 神仙：張騫、王母、漢武（明）帝、牽牛、織女；
- (12) 兄弟：田真兄弟、恆山鳥；
- (13) 敦信：延陵季子、左伯桃、參辰；
- (14) 慈惠：漢武帝、楊朱；
- (15) 孝友：曾參、王寄、孟宗、郭巨、董永、高柴、蔡順、尹伯奇。

在歸類之後，他並提出了簡明扼要的論點說：「從以上諸人之排次，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識的把數人彙聚一處，有如類書之分類，實具類書性質，亦開《佩文韻府》等以韻文分類檢索諸類書的開端。」³⁹這正說明了《古賢集》編排形式具有類書分類隸事的特質。從前節有關類書與蒙書關係之論述中，我們不難理解此種現象的產生，且其關係不僅止於性質上的關連，正如同李嶠的詠物詩集《雜詠》與類書之關係一般。除了人物的次序排列外，《古賢集》的內容，在人物、事類的來源方面，明顯的是依憑當時流行的類書。以下謹參考陳慶浩〈古賢集校註〉及王三慶《敦煌類書》校箋篇的資料，將《古賢集》中與類書相關之詩句一一梳理，發覺其人物見諸於敦煌本類書《語對》的比率相當的高。

³⁹ 見《敦煌類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3年6月），頁121-122。

《古賢集》

P.2524《語對》

匡衡鑿壁偷光學	「勤學」類『穿壁』條注：「匡衡字稚，東海人。家貧，鑿壁引臨舍火光讀書。」
孫景（敬）懸頭猶恐睡	「勤學」類『刺骨』條注：「蘇秦字季子，讀書至睡，引錐刺股。」
車胤聚螢而映雪	「勤學」類『聚螢』條注：「車胤字武子，家貧無油，胤咸盛數十螢讀書，冬即雪映其所，後仕至司徒。」
羅含吞鳥日才新	「文筆」類『夢鳥』條注：「羅含夢吞五色鳥，文辭日新。」
朱買貧窮被棄身	「棄夫」類『買臣妻』條注：「漢朱買臣，會稽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是產業。妻求去…」
許由洗耳潁川渠	「高尚」類『箕山』條注：「許由字成仲，堯時逸人。堯聞之，聘為九州牧。尤以為污，遂洗其耳會稽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是產業。妻求去…」
巢父牽牛澗上驅	「高尚」類『巢父』條注：「堯時隱人，以樹為巢而處其上，因號焉。」
荆軻入秦身未達 不解琴吟反自誅	「送別」類『易水』條注：「燕丹太子使荆軻刺秦王，祖送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蘇武落蕃思漢帝	「客遊」類『雁書』條注：「蘇武使匈奴，身憑鴈足與傳書漢武射得上林園中雁足得帛書云：武在匈奴，武遂得還。」
結草酬恩魏武子	「報恩」類『結草』條注。
靈輒一食扶輪報	「報恩」類『扶輪』條注：「靈輒者，齊人也。…」
隨侯賜藥獲神珠	「報恩」類『傷蛇』條注。
伯桃併糧身受死	「兄弟」類『併糧』條注。
庭樹三荆恨分別	「兄弟」類『三荆』條注。
恆山四鳥嘆分離	「兄弟」類『四鳥』條注。
割袖分桃漢武帝	「美男」類『董賢』條注。
曾參至孝存終始	「孝感」類『白鳥』條注。

孟宗冬筍供不闕	「孝感」類『冬筍』條注。
董永賣身葬父母	「孝感」類『感妻』條注。
感得天女助機絲	「孝感」類『感妻』條注。
高柴泣血傷脾骨	「喪孝」類『泣血』條注。
蔡順哀號火散離	「孝感」類『火飛』條注。

《古賢集》歌詠的歷史人物，除了見諸於敦煌寫本 P.2524《語對》外，其中有部份人物也見諸於 P.3650《籙金》及 P.3573《略出籙金》、P.4052《事林》、P.3715「北堂書鈔體不知名類書」、P.2021《事森》；還有具蒙書與類書特性的李翰《蒙求》、《雜抄》（一名《隨身寶》）。這些內容互見的現象，足以說明蒙書與類書關係，《古賢集》的情況更是具體例證。

三、《古賢集》的民間歷史意識因素

《古賢集》中歷史人物事蹟的敘述，呈現的是庶民的歷史觀。與傳統的史傳或人事的詠史詩，乃至一般文士大型詠史組詩，均存在著明顯的落差。這所凸顯的正是雅文學、雅文化與俗文學、俗文化本質上的差異。因此，《古賢集》中所歌詠的內容，出現了不少正史所不載的人物事蹟，有的見於稗官小說，有的則是出於民間傳說，正是這種文化差異的最好例證。例如「江妃淚染湘川竹，韓朋守死嘆貞夫」，「董仲書符去百惡，孫賓善卜辟妖邪」，「誰見牛郎別織女，唯聞海客鎮乘查」，「董永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等，其中有些人物故事是敦煌通俗文學作品描寫的題材，這說明了《古賢集》的通俗屬性，呈現的是底層社會的歷史文化。

《古賢集》中所歌詠的人物事蹟，除了與敦煌流行的蒙書與類書互見外，也頗有見諸於今所得見敦煌變文內容的。如：

《古賢集》：「相如盜入胡安學」，敦煌本《秋胡變文》有：「兒聞古者有司馬相如，未學於梓□山封達名而顯；蘇秦不學於鬼谷，六國之印不帶不」；《齟齬書》也有：「發憤長歌十二時：日晷未，暫時貧賤何羞，昔日相如未遇時，恹惶賣卜於廛市。」

《古賢集》：「匡衡鑿壁偷光學」「孫敬懸頭猶恐睡」，敦煌本《孔子項託相問書》：「孫景懸頭而刺股，匡衡鑿壁夜偷光。」

《古賢集》：「專錐刺股有蘇秦」，敦煌本《齟齬書》：「發憤長歌十二時：晡時申，懸頭刺股士蘇秦，貧病即令妻行，衣錦還鄉爭拜秦。」

《古賢集》：「朱買貧窮被棄身」，敦煌本《鬪鋤書》：「發憤長歌十二時：平旦寅，少年勤學莫辭貧，君不見，朱買未得貴，由自行歌自負薪。」

《古賢集》：「蘇武落蕃思漢帝」、「身憑鴈足與傳書」。敦煌變文有《李陵變》、《李陵蘇武執別詞》。

《古賢集》：「燕王被囚烏救難」，敦煌本《鷲子賦》(二)有：「燕王怨秦國，位馬變為驎。」

《古賢集》：「直諫忠臣伍子胥」，敦煌寫本有《伍子胥變文》。

《古賢集》：「韓朋守死嘆貞夫」，敦煌寫本有《韓朋賦》。

《古賢集》：「董仲書符去百惡」、「孫賓善卜辟妖邪」，敦煌本《董永變文》：「董仲長年到七歲，街頭遊戲道邊旁，小兒行留被毀罵，盡道董仲沒阿孃。……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時羞見小兒郎。我兒幼小爭知處，孫賓必有好陰陽。」

《古賢集》：「張騫奉使尋河路」、「王母乘龍戴寶花」、「歎念閻浮漢武帝」、「賈糧奉命度流沙」、「誰見牽牛別織女」、「唯聞海客鎮乘查」，亦見於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

《古賢集》：「庭樹三荆恨分別」、「恆山四鳥嘆分離」，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中也有：「由如四鳥分飛，狀若三荆離別。」

《古賢集》：「孟宗冬筍供不闕」、「郭巨夫妻生葬兒」，敦煌寫本《目連緣起》：「孟宗泣竹，冬月生。王祥臥冰，寒溪魚躍。」

《古賢集》：「董永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敦煌寫本有《董永變文》。

除了見諸於敦煌變文外，其內容也出現在敦煌俗曲歌謠，而傳唱於西北地區。例如隱逸、孝行、勤學人物多出現在 P.2564、P.2633、P.3821 及 S.4129 的「十二時」⁴⁰曲。如《古賢集》：「專錐刺股有蘇秦」、「孫敬懸頭猶恐睡」、「車胤聚螢而映雪」…等，敦煌俗曲〈十二時〉有：「平旦寅，少年勤學莫辭貧，均不見朱買臣未得貴，猶自行歌背負薪。…食時辰，偷光鑿壁事殷勤，丈夫學問隨身保，白玉黃金未足珍。隅中巳，專心發憤尋詩史，每憶賢人羊角哀，求學山中併糧死。…日昃未，暫時貧賤何羞恥，昔日相如未遇時，悽惶賣卜於廛市。晡時申，懸頭刺股是蘇秦，貧病令妻嫂來棄，衣錦還鄉相爭拜秦。」；《古賢集》：「董永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羅振玉《敦煌零拾》所收〈十二時天下傳孝〉則有：「正南午，董永賣身葬父母，天下流傳孝順名，感得織女來相助。」又如「張騫奉使尋河路」，敦煌俗曲 P.3910 中也有專曲歌唱。⁴¹

⁴⁰ 寫卷或標〈十二行孝文〉，或題為〈發憤長歌十二時〉。

⁴¹ 參見鄭阿財〈敦煌寫卷定格聯章《十二時》研究〉（《木鐸》10，1984年6月），頁229-260；又〈從敦煌寫本 P.3910 考察「張騫乘槎」故事之價值〉（《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唐代學會，1990年11月），頁801-820。

不僅人事同出，對歷史人物事蹟的評價相近相承，這些共同性，道出社會底層百姓共同的價值觀與道德觀。無論人物或事件的評價，均直接而形象，其中也凸顯了俗文學與雅文學所呈現出的文化落差。又通俗讀物、童蒙教材在後世俗文學的運用，也相當普遍，在在凸顯了講唱者在說唱過程把握民眾的心理與社會的脈動，這種現象早在敦煌變文中便已出現。例如敦煌本《太公家教》，是現存敦煌蒙書中寫本最多、流行最廣的格言諺語類家訓蒙書，今所知見的寫本總計有44件。由於民間廣泛的流傳，乃有敦煌講唱變文中，引以闡釋經義的，如：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又《太公家教》：孝子事親，晨省暮醒，知飢知渴，知暖知寒。憂則共戚，樂即同歡。父母有病，甘羹不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聞樂不樂，見戲不看，不修身體，不整衣冠，待至疾愈，整易不難。」⁴² 又：書云：「積穀防饑，養子備老。」北京河字12號《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人家積穀本防飢，養子還圖備老時。」⁴³這些便是極為鮮明的例證。

「集合古賢作聚韻，故令千代使人知」的《古賢集》，採七言詩體，集合古代賢人的事蹟加以歌詠，它的作用是普及歷史知識，宛如一部通俗的歷史教科書簡編。他的內容通俗易懂，且契合廣大民眾共同的心理需求。而與流傳於民眾的通俗讀物、講唱變文、俗曲歌謠意趣相近，取向相同。這些都是廣大民眾思想、文化的投射，所共同組成小傳統的民眾文化意識；同時也是一般民眾獲取歷史知識主要便捷的管道。

伍、結語

《古賢集》這一僅保存於敦煌藏經洞的唐五代民間歷史教育的詠史詩，既具有類書的性格，又採近體詩的文體以成編，可說是鎔類書、詠史詩一鑪，用以進行民間童蒙歷史知識教育。其文學水平，雖遠不如唐代詩家之作，也不及晚唐胡曾、周曇等人之詩篇，然而由蒙學，而滲入到民間與講史變文的講唱，民間俗曲歌謠的傳唱，口耳相傳，潛移默化，成為民間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長期以來，在民間發揮了正史與高文典冊所不及的影響力，主宰著民間百姓的歷史觀，是觀察廣大民眾小傳統文化的窗口之一。

敦煌文學文獻最受矚目的當然是僅見存於藏經洞所保存的文學作品，但就整體而言，藝術成就足與傳世唐人作品相媲美，甚至是唐人超拔絕倫的作之作的，除韋莊《秦婦吟》等少數外，其他多半為民間通俗作品。雖然如此，但有的文學史上，具有文體發展的價值；有的在語言、形式上，有其獨特的風格；有的在題材、內容上，有其鮮明的題材，絕不因其藝術成就不高，而失卻其研究價值與意

⁴² 見潘師重編《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3年7月），頁449。

⁴³ 同上注，頁420。

義。如變文是僅見於敦煌文獻中的唐五代講唱文學，是講唱文學的祖禰；敦煌《雲謠集》的發現，使自來以五代時期趙崇祚《花間集》為中國最早詞集的說法，亟需改寫，而其他敦煌曲子詞的保存，更可資考察唐五代民間詞過渡到文人詞的發展；敦煌王梵志詩、學郎詩等白話、通俗、俚俗的語言與內容，雖然藝術成就不高，卻是唐代傳世文獻所罕見且最能反映民間百姓生活與社會文化的作品。

敦煌文學中絕大多數的通俗文學文獻，雖然藝術性遠不如傳世的唐代文士之作，但它所具有的民間歷史文化特色與意涵，卻是反映上層社會雅文化所欠缺的，敦煌藏經洞在偶然的情況下封閉，千年之後又在偶然之下重見天日，這個偶然的發現卻不經意的為我們留下千年前敦煌地區各階層人民生活的活化石。透過這些文學文獻，一方面可印證唐代的民間文化，凸顯敦煌的特色與研究意義。同時也可拓展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材料與文化相結合的多元視角研究。